

由人物改传看《新唐书》的尚德倾向

邢香菊,郭慧丽

(1. 石家庄工程管理专修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2. 河北工程大学 文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旧唐书》和《新唐书》是反映同一时代内容的纪传体史书。由于两《唐书》的产生时间和主编者文学修养的不同,使得两《唐书》具有一定的差异。文章从《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比较入手,通过传主归属位置的变化来探究《新唐书》的尚德倾向以及造成此种倾向的原因。

[关键词]《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尚德;士风

[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09)03-0081-03

《旧唐书》和《新唐书》^[1],习惯称为“两《唐书》”,它们是反映同一时代内容的纪传体史书。《旧唐书》成书于五代时期,《新唐书》形成于北宋中叶(仁宗嘉祐五年,1060),宋朝正面临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由于成书年代以及编修者的不同,两《唐书》存在一定的差异。对比《新唐书·文艺传》和《旧唐书·文苑传》,我们会发现某些人物的归属位置发生了变化。

一、从“文苑”到“隐逸”

贺知章,在《旧唐书》入《文苑传》,而在《新唐书》入《隐逸传》,与包融、张旭、张若虚并称为“吴中四士”。四士以浪漫的人格风神、脱俗的言行举动为人瞩目。《隐逸》本传一开始就介绍了贺知章的风流性格,“性旷夷,善谭说,与族姑子陆象先善。象先尝谓人曰:季真清谭风流,吾一日不见,则鄙吝生矣”。又写了晚年之放旷,“知章晚节犹诞放,遨嬉里巷,自号‘四明狂客’,及‘秘书外监’,每醉,辄属辞,笔不停书,咸有可观”。最后写他归乡,“天宝初,病,梦游帝居,数日寤,乃清为道士”。^{[2](p566-567)}同时代的人和后人赞颂了贺知章的放达,皇帝李隆基有《送贺知章归四明》^{[3](p1)}诗云:“遗荣期入道,辞老竟抽簪。”杜甫《遣兴五首之四》说:“爽气不可致,斯人今则亡。”杜甫又称之为“酒中仙人”。朱放认为他是“逍遥一外臣。”温庭筠的“荣路脱身终自得,福庭回首莫相忘”^{[4](p726)},叶梦得的“一笑陶彭泽,千载贺知章”^{[4](p726)}也表达了对贺知章的仰慕之情。有两则故事同样体现了贺知章的淡薄名利。一是“金龟换酒”。李白在《对酒忆贺监二首并序》提起此事:“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另一则见于《太平广记》“神仙四十二”引《原化记》,记述贺知章如何“入道还乡”的经过,虽荒诞不经,但有助于了解他人生态趣与价值观念之变化。

隐士作诗、吟咏的目的并非为了传世不朽,而是“适性怡情”,从日常生活中提炼诗意,用诗意塑造超凡脱俗的高雅人生。贺知章的写景、咏物、赠别、抒情的诗篇感情真挚,笔致洒脱,最能体现个性。如“主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漫愁沽酒,囊中自有钱”(《题袁氏别业》),描写他和主人林泉邂逅、买酒畅饮的生活片段,诗人热情坦荡的形象跃然纸上。

总之,《新唐书》作者正是从贺知章超凡脱俗、淡泊名利的品性才将之归入《隐逸》。

二、由“文苑”到“卓行”

《新唐书·卓行列传》,共一卷,仅记7人,事迹都是

“不污贼,据忠自完,而乱臣为沮计”^{[5](p574)}。司空图和元德秀在《旧唐书》中入《文苑传》,《新唐书》中被改入《卓行传》,表明史书作者对二人道德节谊的宣扬。

对于司空图的人品,后人给予高度评价。《五代诗话》云:“唐末人品,以司空表圣为第一。”宋祁亦称司空图为贤者:“噫!表圣,贤者也。”^{[6](p663-664)}总体来看,司空图为人称道的人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淡泊名利。两《唐书》都记载了司空图辞官不拜的经历。然而,两《唐书》表述上有异。柳璨诏图入朝,《旧唐书》说“图懼见诛,……堕笏失仪”,《新唐书》说是“柳璨……诏图入朝,图陽堕笏”,前者表现的是人物的惧怕心理,后者则突出的是人物勇敢的行为。在记录王重荣父子兄弟馈遗之事时,《旧唐书》说“伏臘馈遗,不絶于途”,《新唐书》说“数馈遗,弗受”,后者因点明对待“馈遗”的态度而使得人物不为金钱所动的行操更加鲜明。

其二是“忠”,忠于国君,忠于唐王朝。《唐书》对司空图的死亡原因表述上有一定的不同。听说唐帝遇弑的消息,《旧唐书》说他“不怛而疾”,《新唐书》则云“不食而卒”。“不食而卒”,“不怛而疾”,一字褒贬,二者相去甚远,前者更突出他的一片忠心。修撰史书,旨在以古鉴今,决非仅止于去伪存真、敷陈史实而已。宋王朝又是直接承传五代而建立的,褒贬之间稍有不慎,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司空图果真是“不食而卒”吗?王鸣盛指出,《新唐书》这样说缺乏根据,这只不过是“成人之美”。^{[7](p1045)}《新唐书》之所以不顾史实,用意十分明显,就是凸显像司空图这类文人的凛凛之志。其实,司空图避乱晦迹,并且一些诗句如“时取一壶闲日月,长歌深入武陵溪”、“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等写出了他的隐居心态,本可以置于《隐逸》。《隐逸》的择录对象就是那些“身藏而德不晦”、“持峭行不可屈于俗”、“使人常高其风”^{[8](p5993-5994)}的隐士,比如孙思邈在《旧唐书》入《方伎》,《新唐书》改入《隐逸》,以其人品高,不仅是因医术高明。所以赵翼指责道:“司空图避乱晦迹,人之‘隐逸’可矣,乃又创立‘卓行’一门以位置之。”^{[9](p353-354)}

不管是创立“卓行”,还是“美化”司空图,史书作者就是在标榜文人中的品行佼佼者,以督促士人效仿。另一位由“文苑”到“卓行”的人物是元德秀。

两《唐书》均记载了元德秀的孝行、宽厚待民、甘于贫贱等事,《新唐书》又增加以下事迹:

一是乳兄子。“兄子襁褓丧亲,无资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数日湏流,能食乃止。”此事近于荒唐,一个男子,无论怎样努力,也不会产生乳汁,《新唐书》竟然说“数

日湮流”，真是莫名其妙。这种夸大，无非揄扬传主的德“秀”。

二是歌《于菀于》。开元二十三年，玄宗出游洛阳，在五凤楼搭设舞台，令各地呈献歌舞。许多官吏抓住这次机会，劳民伤财，歌颂太平盛象。元德秀“惟乐工数人，联袂歌《于菀于》，此歌舞反映的是鲁山一带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现实。玄宗深受感动，“异之，叹曰：‘贤人之言哉！’”，并“黜太守”。传主在皇帝面前的表现不同一般，真可谓“卓行”。

三是扶危救困，“所得俸禄，悉衣食人之孤遗者”。

四是时人之评。房琯每见德秀，叹息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尽。”苏源明常语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耻者，识元紫芝也。”《新唐书》本传又引李华的《三贤论》，李把萧颖士、刘迅、和元德秀并称为三贤，“德秀志当以道济天下”，尤其是元结，其语高度概括了他的兄长奇特的一生。元结与元德秀是兄弟兼师生关系。元结受兄长影响很深^[10]，所以元结评论其兄曰：“生六十年未尝识女色、视锦绣，未尝求足、苟盛、佚色，未尝有十亩之地、十尺之舍、十岁之僮，未尝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餐。吾哀之，以戒荒淫贪佞、绮染梁肉之徒耳。”^[11](p5563-5565)。

三、由“文苑”到“叛臣”

《新唐书》把文人中的道德典范司空图 and 元德秀置之《卓行传》，相反，把文人中的败类——李巨川放入《叛臣传》。

李巨川曾是韩建的部下。韩建担心皇帝的卫兵强大，于己不利，就和巨川密谋，“即上飞变，告八王欲胁帝幸河中，因请囚十六宅，选严师傅督教，尽散麾下兵，”一次不成，“书再上，帝不得已，诏可”，并且又废掉殿后军，只留三十人为控鹤排马官，“自是天子爪牙尽矣”。怕皇帝不听，韩建在宫殿周围以军队要挟，直到皇帝答应诛杀定州行营将李筠，这才解兵。^[12](p6409-6410)《唐摭言》卷十也说巨川“失身于人”^[13](p1668)。

《唐摭言》虽然说的是失身于宦官的养子，但也能证明巨川确有失节之事。巨川跟随韩建这样的人，而且与之密谋削弱皇帝势力，确实是背叛了唐王朝，这样的人放入《文苑传》有些不妥，正如王鸣盛所说：“李巨川旧入文苑，非也，新改叛臣，是也”^[14](p918)。

四、《新唐书》尚德倾向的成因。

通过上文论述可知，《文艺传》评判人物时，比《文苑传》更加严厉和谨慎，这样使得它在选录某些人物的时候也从道德价值取向出发，根据他们品德的高低来安排他们的位置。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评价的差异呢？

首先是和当时士风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唐帝国经历了安史之乱，不仅经济萧条，世风也与日俱下。尤其到了五代，社会的道德遭到惨烈破坏。当时流行的风尚，首先是贪得无厌，追名逐利。“至于儒者，以仁义忠信为学，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不顾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为荣者，可胜数哉！”^[15](p335)其次，首鼠两端，叛服无常。欧阳修指出，五代是“置君犹易吏，变过若传舍”^[16](p173)。最典型的是冯道。他奉事四姓十君，还自称“长乐老”，一点忠信节义观念都没有^[17]。对于这样的行径，时人不但批评，还津津乐道。再有就是人伦灭绝，不顾天理。兄弟相残，骨肉争斗的事司空见惯。世风必然影响到士风。随着皇权的衰败，“士人与皇权的关系从此无可挽回的走向疏离”，“有一些作家冷眼旁观，不再关心唐廷的存亡，注意力转向自我图存和明哲保身的狭小天地”^[18](p84-86)。

《旧唐书》形成于晚唐五代时期，它对言与行关系的看法见于《旧唐书》卷九四：“凡人有言，未必有德。崔与卢、徐，皆攻翰墨。文虽堪尚，义无可则。备位守常，

斯言罔忒。”

这里，它提出一套“言行二元论”的主张，认为“凡人有言，未必有德”。这种提倡，正反映了晚唐五代作家们的堕落。

《文艺传》之所以在评论文人道德修养时更加谨慎的原因，除了与宋代学术风气的转变相关，更与宋人的整体精神风貌有着密切的联系。宋代皇帝很重视士人的品节风范。仁宗认为轻薄少年“不足为台阁之重”，英宗“尤恶谄谀”，怒“妖妄”^[19](p42,44)。《文艺传》形成于北宋中期，这时的士风得到了很大改善，士人在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人格理想重新树立起来。顾炎武论前古士风之变，尝以东汉与北宋仁宗之世为两大转折：“宋自仁宗在位四十余年，虽所用或非其人，而风俗醇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20](p473)。钱穆先生曾论及宋人自觉的精神，“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得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21](p558)。特别是真宗仁宗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积也”^[22](p13149)。有宋一代，忠臣义士的数目，超越前代，查《忠义传》，煌煌十卷，所载278人之多。而《新唐书·忠义传》只有三卷，所载59人。可见宋代崇尚气节之一斑。因此，宋人明显区别于唐人、特别是晚唐五代之人^[23]。

其次与编撰者的强调德艺分不开。

欧阳修与宋祁是在上述士风的熏染下成长、并且是这种风气的提倡推动者。二公也把人品与文品联系起来，欧公尤其显著。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和他崇高的人格无法分割。他曾提出“三不朽”^[24](p631)，可以说，人格、政绩、文章正是欧阳修致力追求、以求人生不朽的三个方面。他的人格在当时就受到高度评价，时人称赞他“见义敢为”，“奖进人物，乐善不倦”，“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25](p315)。关于文行关系，欧阳修提出“中实文辉”的看法，这是欧阳修对古文创作与作家思想修养关系的看法，与韩愈的“气盛言宜”十分接近。他在《与乐秀才第一书》和《答程择之书》中强调只有加强作者思想修养，才能增强文章的感染力，才能更好的发挥文章的社会作用。他的大量针砭时弊的作品即是他高尚人格的体现。《与高司谏书》是一篇范仲淹抱不平的言论。《论台谏官言事未蒙听书》对仁宗“好疑自用”，不肯革弊纳谏提出直截了当的谏诤。《非非堂记》是针对当时阿谀之风而发的愤慨之词。《论杜衍、范仲淹等墨政事状》比《朋党论》辨析忠奸更为淋漓尽致。

欧阳修在评论他人时，也多把文行联系起来。《与韩忠献王》说梅尧臣“以文行知名”，《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赞誉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论李疏奸邪札子》说“自古有文无行之人，多为明主所弃”，认为李淑奸邪阴险，不宜任词臣。

宋祁虽然喜游宴，且受人们非议，然而，他毕竟是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封建士大夫，有强烈的兼济天下之志，《宋史》(卷二八四)说他“治事明峻”。宋祁论文主张“切用”：“公之所著，直取其切，与夫雕章缛采，不周于用者，将有间焉”。负有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是宋人涵养的第一层面。宋祁有着维护封建统治的责任感与事业心。他曾表明自己的志愿：“何以为报我知之，奉扬仁风尉黎庶。”(《谢提点刑狱李郎中赠扇》)尽管仕途多变，他总能兢兢业业，勤政爱民。《邵氏闻见录》记载，宋祁死讯传到成都时，“士民哭于其祠者数千人”，所以，邵博说，“谓不安其侈者，诬矣。”(《邵氏闻见录》卷一九)宋祁向仁宗建议加强皇

权,说道,“臣闻君以操柄为重,臣以奉命为恭。柄舍之,则重者反轻;命窃之,则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爵赏之典,刑罚之权,虽览群言,一决宸虑,无委成假借,以开贵近牵制之私。……若夫后宫戚里,祈恩焉赏者,日月不乏。陛下且当断而不听,以示至公。内省黄门,给事左右,亦宜数加训敕,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阳抑阴之术也”^[26](p197)。在他任权三司度支判官时,向仁宗上《三冗三费疏》,是很切中时弊的。庆历改革中,宋祁开始是合作的,曾上奏疏指出教育制度的弊端。^[27](p1360)他还呈递了不少有价值的奏疏,如《上便宜札子》等。看来,宋祁没有沉湎于酒色,而是高度关注着现实。

欧、宋二公都是深受儒学浸润、关心社会现实、崇尚德艺融合之人。他们提出的“道纯”则“中实”、“中实”则“文辉”及“强君威,别邪正”等等主张,都是尊儒尚德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对“文道”关系中“道”的最好阐释(只是以“德”代替了“道”)。这种强调士人品行及道德修养的理念,不能不影响到对史书中人物的评价。《文艺传》(包括全部《新唐书》)中对人物的谨慎评判,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宋的思想观念。

[参考文献]

- [1] 本文《旧唐书》和《新唐书》皆用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
- [2] 以上引文见《新唐书》卷一九六,列传第一二一。
- [3] 《全唐诗》册1,卷三,页31。
- [4] 《秘书省有贺监知章草题诗,笔力遒健,风尚高远,拂尘寻玩,因有此作》,《全唐诗》册17,卷57。
- [5] 《新唐书》卷一九四,列传一一九。
- [6] 《题司空图诗卷末》,《全宋文》,册12,卷516。
- [7]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下),司空图“不怛而疾卒”,卷七十。
- [8] 《新唐书·隐逸传序》,卷一九六。

- [9] 《廿二史札记校正》卷十六,新书改编各传。
- [10] 颜真卿《元君表墓碑铭》说元结“十七始知书,乃授学于宗兄先生德秀。常著说楚赋二篇,中行子苏源明駭之,曰:‘子居今而作真淳之语,难哉!’”《颜鲁公集》卷五,上海古籍,1992年11月第1版(四库唐人文集丛刊),页35。
- [11] 以上引文见《新唐书》卷一九四。
- [12] 《新唐书》卷二二四下,列传一四九下。
- [13] 《唐摭言》卷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 [14] 《十七史商榷》(下),卷七十,新改旧有是有非。
- [15] 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12月,册2,卷三三,《死事传序》。
- [16] 《新五代史》,册1,卷一六,《唐废帝家人传论》。
- [17] 冯道《偶作》云:“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前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豺狼丛中也可立身。”
- [18] 张兴武《五代作家的品格与诗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3月。
- [19] 《东轩笔录》,卷四。
- [20]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宋世风俗》,岳麓书社,1994年5月,卷13。
- [21] 《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 [22] (元)脱脱《宋史·忠义传序》,中华书局,1977年11月,册38,卷446。
- [23] 王夫之也将唐宋二代士大夫的修养作了比较,认为宋代风气与唐不同。(明)王夫之著,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读通鉴论》,《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1988年2月,卷26,页1004。
- [24] 《送徐无党南归序》,《欧阳修全集》,卷44。
- [25] 《苏东坡全集》,册上,卷24。
- [26] 《请下罪己诏并求直言疏》,《全宋文》卷489。
- [2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七“庆历四年三月甲戌条”。

[责任编辑:王云江]

Discuss the tendency of esteeming virtue in Xintangshu literature biography from the change of the biography

XING Xiang - ju, GUO Hui - li

- (1. Shijiazhua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2. College of Arts,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Jiutangshu and Xintangshu are the official historic books that reflect the same content about the same age. Because they were written in different era and by different authors, Xintangshu is different from Jiutangshu.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then discusses the tendency of esteeming virtue in Xintangshu Literature Biography and the reasons.

Key words: Jiutangshu literature biography; Xintangshu literature biography; esteeming virtue; scholar style

(上接第52页)

[参考文献]

- [1] 何增强. 城乡客运一体化建设的问题与对策[J]. 河北工程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 23.

[责任编辑:王云江]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informationized management of road transportation

HE Zeng - qiang

(Transportation Bureau of Handan City, Handan 056002,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s and net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y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the fundamental indust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road transportation has gradually realized digitalization, intelligence and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which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The author analyzed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of road transport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forward basic train of thought and patter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Key words: road transpor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